

庄诺亚, 杨忍, 陆进锋, 翁时秀. 2022. 艺术介入乡村: 两种乡村发展转型典型模式的多级效益比较分析. 热带地理, 42 (3): 396-408.

Zhuang Nuoya, Yang Ren, Lu Jinfeng, and Weng Shixiu. 2022.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Level Benefits of Two Typical Mod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ropical Geography*, 42 (3): 396-408.

艺术介入乡村: 两种乡村发展转型典型模式的多级效益比较分析

庄诺亚, 杨忍, 陆进锋, 翁时秀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明晰国内艺术介入乡村内涵与典型模式的基础上, 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建构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 并选取广州市小洲村、凤和村为典型案例, 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识别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艺术介入模式的效益特征与问题。结果表明: 1) 艺术介入乡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政府、资本、艺术家与文化团体等主体, 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多级效益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依据不同的驱动主体, 可将艺术介入乡村模式主要划分为艺术家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两种类型。2) 艺术介入乡村具有物质、经济、社会、文化四级效益, 呈现逐级递进的特征。3) 艺术家主导型在实现高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 低层级效益有所欠缺; 资本主导型在实现低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 高层级效益有所欠缺。4) 构建资本与艺术家协同、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多方合作模式, 能够综合两种模式的效益优势, 使艺术介入的乡村实践更具推广性。

关键词: 艺术介入乡村; 多级效益;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小洲村; 凤和村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2)03-0396-13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5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介入式艺术, 又称参与式艺术、社区艺术, 是公共艺术的一种, 指与当代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艺术实践, 具有“公共现场性”的特征(周彦华, 2021)。此前艺术介入多出现在城市空间, 具有塑造城市认同、激发空间活力等积极意义(杜宏武等, 2009; 邱冰等, 2016; 罗子荃等, 2018)。伴随中国城乡发展持续转型, 中国的城乡格局逐渐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刘彦随, 2018), 乡村受城市文化辐射显著, 经历资本下乡与旅游开发热潮, 艺术介入乡村成为新现象与新趋势(方李莉, 2018)。随着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等现象日益加剧, 乡村的沉寂促使人们重新关注传统乡土美学与农业精神, 现代城市社会的乡村田园梦为艺术实践提供土壤(韩凝玉等, 2019)。艺术介入乡村, 或称乡村艺术实践、艺术参与乡村, 是借助艺术实践推动

乡村振兴的一种新发展模式。艺术介入乡村不仅推动乡村景观美化、作为乡村旅游的致富新路, 在社区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方面也有突出成效(陈可石等, 2016; 冯柯等, 2018; 韩凝玉等, 2019)。

艺术介入乡村最先出现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 随之兴起针对艺术介入乡村的综合研究, 主要涉及乡村社会与经济公平(Anwar-McHenry, 2011)、农村创业创新(Balfour et al., 2018)、乡村复兴与过度旅游(Park et al., 2020)等议题。艺术作为一种资源被认为具有带动农村发展与可持续的正面影响(Mahon et al., 2018; Anwar-McHenry et al., 2018; Qu et al., 2020)。经济上, Markusen(2007)提出的艺术实践为农村地区提供替代性的、面向当地的经济路径, 其直接与衍生的活动扩大了当地商品与服务的辐射范围; 文化上, 澳大利

收稿日期: 2021-08-24; 修回日期: 2021-12-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77、42171193、41801088)

作者简介: 庄诺亚(2001—), 女, 山东日照人, 本科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E-mail) zhuangnuoya@126.com;

通信作者: 杨忍(1984—), 男, 贵州毕节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 (E-mail) yangren0514@163.com。

画旋转画廊案例认为艺术构成村民归属感与创造力的来源，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Waite et al., 2013)；制度上，艺术在变化的农村环境中为人们参与地方发展活动、促进发展议程形成提供广泛的可能性 (Mahon et al., 2019)。部分学者认识到不同情境下的艺术介入局限，如农村创意政策制定未能跳出城市主导的经济与文化话语，丧失其独特性与多样性 (Bell et al., 2010)；偏远农村的艺术中心可能面临对外来管理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等问题 (Seet et al., 2015)。中国艺术介入乡村还处于发展初期，相关研究比较有限，主体集中于案例的深度剖析，涵盖了城乡规划、建筑学和艺术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艺术介入的社区营造 (陈可石等, 2016)、农业精神传承 (韩凝玉等, 2019)、美丽乡村建设 (方李莉, 2018) 等。但目前存在以下不足：艺术介入乡村的综合定义与类型界定有待深化，尚缺乏对其效益的系统总结；多关注艺术介入乡村的正面案例及其效益，对艺术介入不同模式的局限性关注有限。鉴于此，本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尝试建构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并以广州市小洲村、凤和村为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的代表案例，识别2种艺术介入乡村模式的效益特征及问题，尝试提出主体合作优化建议。以期为艺术介入乡村模式的完善与推广提供借鉴，支撑乡村转型发展的科学决策。

1 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构建

1.1 国内艺术介入乡村的内涵与典型模式

综合现有研究，概括出国内艺术介入乡村的3个属性：1) 政策背景战略性。艺术介入乡村立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战略命题，美丽乡村、乡村旅游、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具体路径体现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多重诉求 (段威等, 2014; 黄诗雨等, 2020)，存在国家重大战略推动的特有乡建特征，如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等。2) 参与主体多元性。艺术介入乡村主体通常涉及艺术家、村民、政府、当地协会、学者等多元主体 (赵容慧等, 2016)。多元主体协同互助，最终搭建起一个景观亮丽、产业兴旺、人际和谐的新乡村社区 (赵容慧等, 2016)。3) 多级效益综合性。指艺术介入乡村在物质 (卢健松等, 2012)、经济 (杨金华等, 2019)、

社会 (赵容慧等, 2016)、文化 (韩凝玉等, 2019) 等多级尺度上，对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与治理、地方文化发扬等方面，具有多维促进作用。综上，国内艺术介入乡村可定义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府、资本、艺术家与文化团体等主体，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多级效益的乡村振兴模式。对于艺术介入模式，根据驱动主体分类，典型艺术介入乡村模式涉及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Wang (2018) 提出艺术专业人士领导下的场所营造更关注乡村脱贫与发展，政府与私人开发商合作领导的场所营造关注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精英阶层或快速收获经济回报。本文认为，艺术家主导型通常指艺术家自发进入乡村进行艺术实践 (陈可石等, 2016; 陈锐等, 2016; 邓小南等, 2016)，通过塑造在地化艺术场景 (李方悦等, 2018)、鼓励人在艺术实践中参与 (刘妹曼, 2020) 等以实现其职业抱负；有时可能有专家学者参与，如“许村计划”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社会学系渠敬东等学者发起。资本主导型指资本在逐利目标驱动下，雇佣艺术家进行乡村艺术改造，创造旅游开发的条件 (陈锐等, 2016; 杨金华等, 2019)。其通常表现为租赁农村耕地与宅基地，投资艺术化乡村民宿 (李伟红等, 2019)，促进文化消费与旅游发展等。政府伴有选择性参与的角色，兼具利益最大化与乡村振兴责任双重价值导向。目前对艺术介入的主流讨论集中于艺术家主导型，而资本主导型更多被置于乡村旅游的语境下。

1.2 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并综合现有案例研究，可将艺术介入乡村的主要效益归纳为四级：物质景观美化与人居环境改善 (陈可石等, 2016; 赵容慧等, 2016)；旅游经济效益与村民收入增加；优化社区治理与乡缘网络 (陈可石等, 2016; 陈锐等, 2016; 刘雨菡等, 2016)；增强地方认同与文化遗产 (赵容慧等, 2016; 方李莉, 2018; 韩凝玉等, 2019)。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胡万钟, 2000) 组织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四级效益 (图1)，发现其对于本地村民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是逐级递进的：1) 物质一级通常体现为艺术元素融入乡村，如台南市土沟村中象征“水牛精神”的水牛雕塑 (陈可石等, 2016)；以及乡村环境整治与美化，强调乡村物质空间重构，如赵容慧等 (2016) 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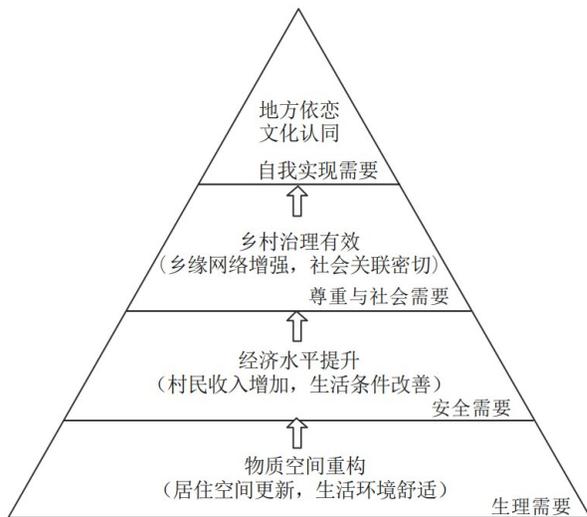


图1 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

Fig.1 The benefit hierarchy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艺术介入打造土沟社区的生态美感, 复育社区生态环境。空间物质条件改善对应需求层次的生理需要, 满足居民对舒适的居住环境、优美的生活空间的需求。2) 经济一级强调乡村旅游带来的产业发展、村民增收与生活条件改善。如日本濑户内海艺术祭吸引资本进行旅游地产开发与旅游产品设计, 创造可持续收益(陈锐等, 2016)。温饱与经济水平提升对应需求层次的安全需要, 使村民获得就业保障、收入增加, 强化其获得感与稳定感。3) 社会一级突出艺术介入带来的村社治理成效, 各主体社会关系和谐, 社区凝聚力增强。如刘雨菡等(2016)提出艺术介入社区营造具有传递社区价值、激发认同感与归属感等意义。乡村治理与凝聚力增强对应尊重与社会需要, 乡缘网络的密切联结增强村民的集体认同, 使之获得信任与归属感。4) 文化一级体现艺术介入对于促进村民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积极意义。如方李莉(2018)提出艺术介入“发现乡村价值”, 是对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导向牺牲乡村的反思。地方依恋与文化认同体现更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村民通过艺术氛围获得精神愉悦, 并强化地方价值认同。

四级效益并非彼此割裂, 孤立存在。首先, 对象视角下, 单一艺术介入乡村案例可能兼有四级效益, 或较突出体现其中一到二级。如赵容慧等(2016)在对艺术介入下新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中, 提出艺术介入带来生活美学、生态美感与生产文创的多维影响, 分别体现文化、物质、社会三重效

益。同时, 各级效益之间相互依存, 彼此转化: 1) 物质效益常作为其他效益的实现基础: 如物质景观改善有益于旅游经济创收、村民可以围绕有形的艺术实体开展社会交往、物质性实体构成文化的承载形式。2) 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的影响或正或负: 一方面经济效益带来村民增收, 生活富足可能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融洽; 另一方面, 旅游开发可能消解乡缘网络的稳定性, 利益分配不均使村民愈发独立为原子化个体。3) 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相辅相成: 艺术强化的文化认同促进社会联系与集体意识; 人际关联紧密构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土壤。4) 在一个案例中, 各级效益往往是复杂、广泛联系的。如冯柯等(2018)提出“设计富民”的艺术介入策略, 将其作为内生动力式的扶贫手段——通过物质景观改造提升居住者的精神富足感, 提升村民致富的主观能动性。经济、文化效益的实现有助于社区认同增加, 物质景观改善也有益于经济效益。其次, 效益视角下, 四级效益存在层级高低, 其中物质与经济是基础性的低级效益, 社会联系与文化是建立在低级效益上的高级效益。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各层次需要的实现呈宝塔形, 下层需要为基本需要, 影响人的日常生活, 越高级的需要往往有更高的达到条件, 且以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为前提(蔡继红, 2011; 胡家祥, 2015)。因此, 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低级效益, 在此基础上致力于高级效益, 因为低层级效益的落后可能会限制高层级效益的推进。

2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2.1 艺术家主导型——小洲村

小洲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南端(图2), 为广州市十二处传统村落之一。作为万亩果园核心区, 小洲村被评为“首批全国生态示范村”“最佳文化古村镇”等。小洲村村域总面积4.5 km², 总人口10 000多人, 常住人口约6 500人, 近半数均为流动人口。其艺术介入经历了岭南水乡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21世纪初艺术精英自发聚集阶段, 以及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方远平等, 2018)。20世纪60年代关山月等艺术大师自筹资金在小洲村建造“艺术村”, 此后吸引大批艺术家追随, 在此从事艺术创作。同时由于临近艺术高校、且传统村落创作环境典雅、房租低廉, 巅峰时期小洲村集聚了几十位卓有名望的艺术家, 以及不可计数的艺术爱好者与艺术学生, 是艺术家主导型艺术

介入乡村模式的典例。

2.2 资本主导型——凤和村

凤和村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西北部，距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3 km，机场高速公路北延线、106国道穿过村庄，交通条件较为优越（见图2）。村域面积4.19 km²，辖有13个自然村，21个经济合作社，户籍人口约5 600人，外来人口约2 300人。凤和村建村于清嘉庆年间，历史悠久，至今仍保留许多三间两廊的清代岭南传统民居。2017年，借力乡村振兴政策，广东省机场集团联合力迅投资等民营企业共同在凤和村投资建设全国首个空港文旅特色小镇。项目采用“政府指导+村民合作+企业实施”的微改造模式，借力空港经济生态，通过招募艺术家群体，利用文化艺术焕新乡村——举办全球级当代艺术联展、建立艺术家工作室、建设艺文书馆与艺术互动专区。目前该项目在物质景观美化、村民旅游增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已获评广东省宜居城乡类重点建设项目，各类艺术活动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往参观。因此凤和村是资本主导型艺术介入乡村模式的案例，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2.3 方法

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方法，以半结构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等手段收集资料。于2021年4和8月3次前往小洲村实地调研，2021年3和5月4次前往凤和村实地调研。调研主要采用非参与式观察、问卷与半结构访谈的方法，了解小洲村与凤和村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当前发展。小洲村半结构式访谈主体21人，包括艺术家7人、村民14人，其中深度访谈12人（表1），分别回收游客与村民有效问卷18与27份；凤和村半结构式访谈主体34人，其中深度访谈村委2人、企业代表1人、村民代表4人、商家代表4人（表2）。调研中获得凤和村电子资料《凤和改造札记》——由进驻凤和村的开发公司迅和港和凤和村村委会共同编撰，详细记载凤和村历史脉络、空港艺术小镇建设背景、建设过程及成效。另外，还基于网络收集小洲村与凤和村空港小镇的相关报导、纪实、

地方志以及公开的规划建设文件。

3 案例发展模式与综合效益比较

3.1 小洲村艺术介入模式与效益

3.1.1 小洲村艺术介入模式 小洲村共经历岭南古村落发育、艺术精英聚集、文旅产业发展3个阶段（方远平等，2018）。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小洲村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乡村农业生产生活空间占主体；20世纪50年代到2008年为其艺术精英自发聚集阶段——乡村农业生产空间逐渐消亡，创意阶层推动艺术创意空间逐步出现。2008年至今为其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在政府与资本推动下，艺术创意空间不断发展，催生创意旅游空间。小洲村的艺术名片与第二阶段艺术家的进入直接相关。其艺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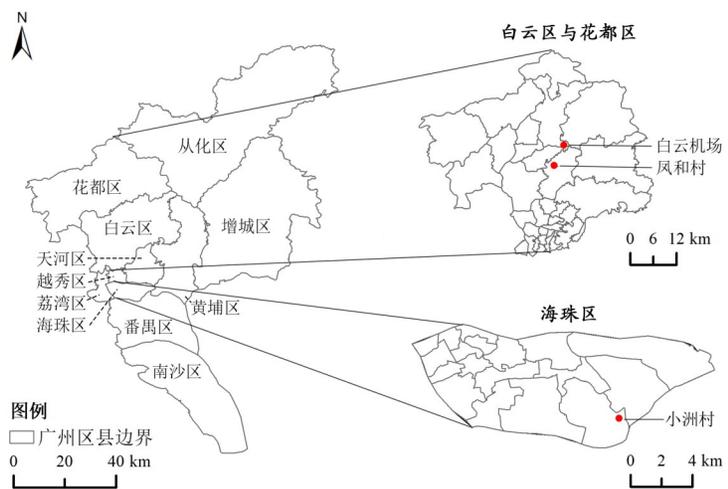


图2 小洲村与凤和村区位

Fig. 2 The location of the Xiaozhou and Fenghe Village in Guangzhou

表1 小洲村深度访谈属性

Table 1 In-depth interview attribute table of the Xiaozhou Village

编号	小洲村访谈对象	时长	主要内容
2021081301	青年村民 A	20'49"	综合感受;艺术参与情况
2021081302	书法老师 B	25'50"	进入原因;艺术实践;与村民互动
2021081303	书法老师 C	25'50"	进入原因;艺术实践;与村民互动
2021081304	老年村民 D	25'50"	环境状况;土地收入;艺术家经营现状
2021081305	老年村民 E	25'50"	环境状况;土地收入;艺术家经营现状
2021081406	青年村民 F	22'50"	环境状况;艺术参与情况;个人态度
2021081407	老年村民 G	46'18"	环境感受;经济获益;个人态度
2021081408	老年村民 H	46'18"	环境治理背景;经济获益;艺术参与情况
2021081409	青年村民 I	20'10"	自己与其他村民的艺术参与情况
2021081410	老年村民 J	20'10"	环境变化历程;经济获益;个人态度
2021081411	绘画学员 K	20'10"	环境感受;艺术参与
2021081512	青年村民 L	31'33"	整体感知;艺术参与

括自身景观特色、城中村地租优势以及区位优势。20世纪60年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来此居住，出资建造艺术村，其名人效应吸引更多艺术家来此创作。小洲村文化底蕴满足了艺术创作对环境的要求，城中村低租金与低成本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其双重优势为艺术家进入提供了充分条件。并且，临近大学城与广州美院艺术群体的区位优势直接催化艺术家进入。艺术家的进入不仅提高了小洲村知名度，还带来了旅游的经济效益，同时与当地村民的互动产生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的意义。小洲村艺术介入模式如图3所示。

综上，首先，小洲村艺术介入的驱动因素一方面在于其自身文化底蕴对艺术家的吸引，同时其都市边缘区乡村的土地与区位优势为艺术家进入创造了条件。其次，小洲村艺术发展与知名度扩大进而推动资本、政府介入，但艺术家与资本的进驻目的有所不同：艺术家旨在利用乡村优质环境促进艺术创作，并自发推动乡村景观美化、氛围创造与地方文化发扬。而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文旅小镇建设推动经济、增加政绩。资本在政府导向下进入，从事民宿开发与商业经营等活动，利用艺术实现经济效益。

3.1.2 小洲村艺术介入效益 小洲村艺术介入效益

表2 凤和村深度访谈属性

Table 2 In-depth interview attribute table of the Fenghe Village

编号	凤和村访谈对象	时长	主要内容
2021030701	民宿经理 A'	28'36"	旅游收益
2021030702	酒店大堂客服 B'	20'33"	景观现状; 旅游收益
2021030703	本地村民 C'	22'17"	景观感受; 土地收益
2021032204	本地村民 D'	32'55"	改造流程
2021032205	企业代表 E'	65'48"	艺术实践过程; 投入与收益; 与艺术家的协商
2021032906	村委曹主任 F'	51'27"	改造流程; 村民反应
2021032907	村委陈国土员 G'	88'21"	改造流程; 村民反应
2021032908	本地村民 H'	23'41"	改造流程; 质疑收益
2021051609	村大队队长 I'	34'55"	改造流程; 村民反应
2021051610	本地村民 J'	21'41"	项目收益; 整体感受
2021051611	本地村民 K'	24'41"	项目收益; 整体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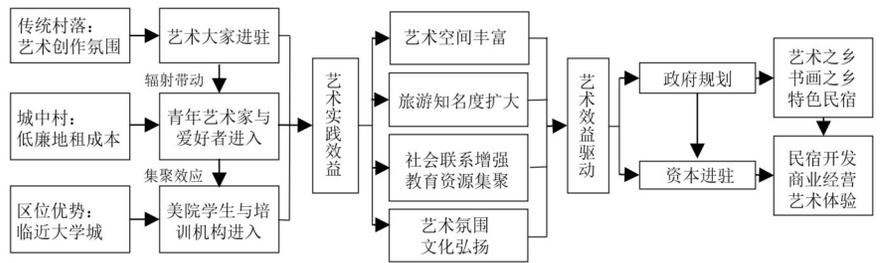


图3 小洲村艺术介入机制

Fig. 3 Art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the Xiaozhou Village

整体在物质、经济的低层级效益方面有所欠缺，但社会与文化的高层级效益相对突出。首先，其正面效益表现在4个方面：1) 艺术空间增加与景观美化。小洲村艺术空间种类多样，存在画室、美术馆、旧物馆、书院、手工艺品制作坊等多种类型(图4)。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工作室与店铺向村民与游客开放，外观上与古色古香的岭南传统建筑相得益彰。2) 乡村知名度提升，游客数增长，村民收入增加。调查问卷显示，50%的游客慕名来此参观村内的艺术实践，60%以上的游客认为村内艺术氛围浓厚或较浓厚。在微博、小红书平台搜索关键词



图4 武馆与书院 (a); 小洲流动美术馆 (b); 艺术展品 (c)

Fig. 4 The martial arts school and academy (a); Xiaozhou mobile art museum (b); Artworks (c)

“小洲村”，90%以上的搜索结果为小洲村旅游攻略与网友游记，高频词为“艺术气息”“假期”“岭南水乡”等。2017年以前游客普遍给予正面评价：有网友描述其为“别有洞天的小洲村”，也有网友称自己的体验“就像场说走就走的短暂旅行”；目前仍有不少网友发布在小洲村的愉快经历，但也有游客指出小洲村近年来出现艺术家迁出、艺术氛围降低等问题。此外，村民沿街摆摊售卖当地特产、向艺术家出租民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收入，其中70%村民认为出租房屋对收入提升最为明显。

3) 社会效益体现为艺术介入给当地儿童带来的教育机会与社会联结增强。村中儿童由当地村民与在村内租房的流动人口构成，小洲村多数儿童因艺术介入获得比普通城中村儿童更多的教育与文化体验机会。首先，艺术家开设的武馆、书院等为村中儿童提供接触文化教育与美学课程的机会（图5-

a)，使之开阔眼界、增长见闻、提升修养。旧物馆店主表示自己将店铺向村内儿童开放而不收取门票，希望感兴趣的孩子能对艺术有所了解。其次，小洲村教育影响增强，教育机构类型多样，涉及艺术培训、应试机构、公益机构、公立学校等（图5-b、c、表3），既增加艺术文化熏陶，也为村中儿童接受规范化教育、获得未来的社会上升途径提供帮助。再次，有村民表示村内艺术活动促进其与其他村民接触，村集体内部凝聚力增强。比如青年村民A提到：“很多小孩子进入小洲村的艺术培训机构，孩子在课堂上彼此之间联系更为密切，所以接送他们的家长之间联系更为密切……记得10年之前在礼堂有搞过行为艺术，参与的村民挺多，大都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吧。将艺术，包括新的艺术形式带到小洲村，如果坚持下来，一定会有积极作用。”



图5 小洲教育空间 (a. 书院; b. 培训机构; c. 瀛洲小学)

Fig. 5 The educational space in the Xiaozhou Village (a. Academy; b. Training institutions; c. the Yingzhou Primary School)

表3 小洲村多维教育空间

Table 3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space in the Xiaozhou Village

类别	名称
盈利性艺术培训机构	广州更高美术学校、浅草学堂、登瀛画院、T5艺术空间等11所
应试教育培训机构	升启教育、园福教育辅导中心
公办学校	广州市海珠区瀛洲小学、小洲幼儿园
民办学校	盈洲幼稚园
教育型公益机构	优沃青少年发展中心(优沃学院)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其他	海珠区图书馆华洲街道分馆

4) 艺术家集聚创造文化氛围，促进地方文化保护与创新。村内书馆、画院密布，多处设计体现艺术家匠心独运，历史文化氛围突出。许多游客在

咖啡馆闲坐，体会艺术与文化氛围带来的精神愉悦。此外，文化效益还体现为地方文化弘扬与村民精神境界提升。艺术实践往往融入地方元素，体现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书院的书法习作会选取与小洲村相关的主题；艺术家经常举办各类艺术展，直接面向村民开放，促进村民精神境界提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村民有所了解并参与过艺术实践，48%村民认为村内艺术活动提供感受文化熏陶的机会。

对于其效益不足，主要是小洲村艺术介入在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村民致富的低层次效益方面的影响有限。首先，近年来小洲村风貌不佳，水涌肮脏、房屋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游客游览心情。

“现在小洲村已经落寞了，环境很差，小桥流水的景象，变成臭烘烘臭水沟、店铺也关得七七八八了。”
——网友跟着风去旅行C

村民D与E闲聊时表示，“以前河涌可以落水游泳，龙船可扒入大祠堂，现在龙船就在登瀛码头扒下就算了。”河道内飘浮着各类垃圾与杂物（图6-a），村内电线乱拉、房屋乱建问题严重（图6-b）。一方面，游客增多带来的环境影响增大；同时政府环境整治缺位，而村民与艺术家无力支撑村庄环境治理成本，因此村庄的环境状况长期恶劣。目前小洲村有少数民宿营业，尚无大型资本投资开发，未进行村庄环境的美化工程。问卷结果

与访谈显示，56%的游客认为小洲村环境有待整治；景观缺陷干扰村民与游客对艺术氛围的感知，从而抑制其文化效益的发挥。因此，低层级效益的滞后会对高层级效益发挥起限制作用。其次，经济效益方面，艺术介入对村民致富的影响有限。游客与知名度扩大促使村民在家门口摆摊贩卖当地特产（图6-c），但自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与大型资本进入开发模式相比，小洲村发展正盛时期，资本进入尚不明显，村内就业岗位提供相对有限；村民出租民宅获得租金收入，但由于乱建房屋，并在房屋出租中竞争压价，村民获得的经济收益也较低，其经济带动作用并不显著。



图6 河道脏乱 (a); 电线混乱 (b); 村民沿街摆摊 (c)

Fig. 6 The dirty river (a); Tangled wires (b); Villagers set up stalls along the street(c)

3.2 风和村艺术介入模式与效益

3.2.1 风和村艺术介入模式 相比小洲村，风和村作为资本主导、政府参与的文旅艺术小镇建设，是资本主导型典例。风和村发展模式采用“政府指导+村民合作+企业实施”的微改造模式，资本下乡雇佣艺术家围绕空港文旅主题进行乡村艺术实践。2017年，借力乡村振兴政策，广东省机场集团联合力迅投资等民营企业在风和村投资建设全国首个空港文旅特色小镇。2019年，该项目荣升广东省重点项目，获政府支持。资本主导下，风和村结合空港主题进行乡村旅游开发与艺术实践——举办全球级当代艺术联展、建立艺术家工作室、建设艺术图书馆与艺术互动专区等。资本作为项目的主导者与建设者，依托临近机场与都市边缘的区位优势、便捷交通条件（同年机场3&9号线地铁高增站正式启用）致力于乡村旅游发展。资

本雇佣艺术家对风和村进行艺术改造，其具体艺术介入乡村模式如图7所示。

3.2.2 风和村艺术介入效益 相较于小洲村，风和村艺术介入效益整体在物质与经济的低层级效益方面相对突出，社会与文化的高层级效益存在不足。对于正面影响，首先，风和港以旅游发展为导向，大力推动空港特色小镇示范区的环境建设。资本进驻前，风和村空心村问题严重，项目区550栋房屋中有200多栋处于闲置状态，本地户籍4670人中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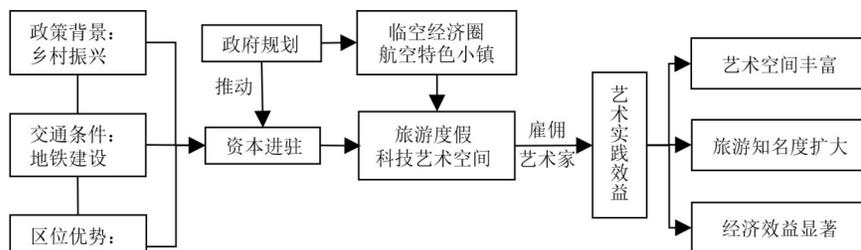


图7 风和村艺术介入机制

Fig. 7 Art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the Fenghe Village

870人常住村内，宅基地空心化率超过36%，房屋破败且环境恶劣（图8-a）。迅和港进驻后对村内环境进行系统整治，对宅基地空置民房进行微改造，并加入艺术元素，村内景观经历较彻底的重整与优化（图8-b、c）。其次，村内业态多元化，村民收入与就业机会增加。一方面，本地村民通过将宅基地出租给迅和港获得土地租金；另一方面，迅和港在机场周边设置住宿、餐饮、机场办公等多种业

态，向村民提供保洁、餐饮等就业岗位。访谈对象I'提到：“自己没有钱来搞，即使有钱，也只能搞好自己的部分，不能像公司那样对整体环境进行美化。公司来搞，不用出钱帮忙建好房子，还有租金收。”而迅和港通过空港小镇一期建设及其艺术实践吸引了大量游客，获评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一期的成功促使二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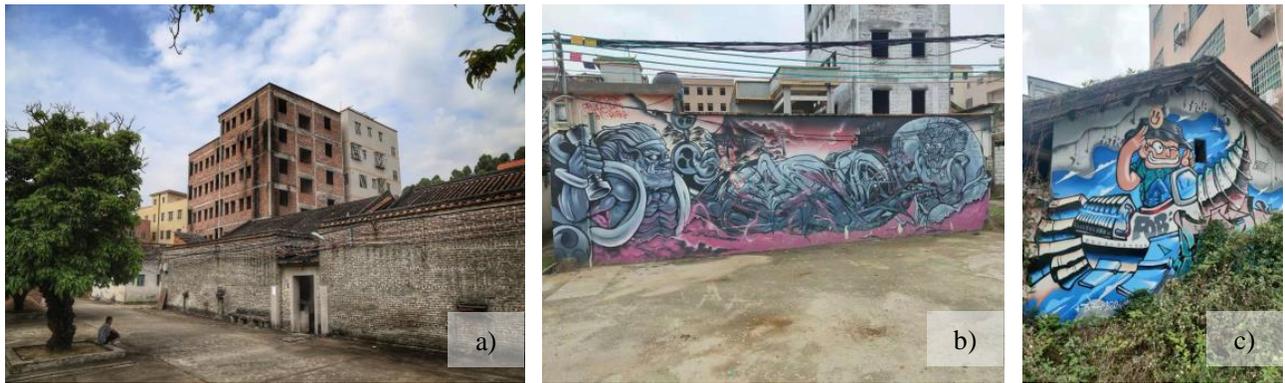


图8 风和村改造前 (a) 及其艺术墙绘 (b、c)

Fig.8 The Fenghe Village before the renovation(a) and its artistic wall paintings(b, c)

但风和村艺术实践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高层级效益十分有限。迅和港与村民的合作协议采取一家一户单独协商的方式，村民间彼此联系很少。且村内空心化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村民外流严重，彼此乡缘联系微弱。文化方面，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尝试将岭南文化与空港小镇主题相结合。如图8-b所示，墙绘融合了岭南传统祠堂元素与空港主题特征。但访谈的村民大多对其表示反感或无感，无法理解墙绘在村庄的意义。如访谈对象C'提到：“这些画都看不懂，我觉得弄得不好”。且艺术实践由艺术家独立完成，村民缺乏了解与参与。艺术实践在文化与精神方面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资本以实现经济效益为主要驱动力，对其文化与社会效益关注有限，艺术家与村民互动不足。这也是资本主导型模式相较于艺术家主导型在高级效益方面的局限。

3.3 两种艺术介入模式对比与问题分析

两种艺术介入模式虽然均取得较好的效益，但艺术介入乡村尚未成为较成熟的乡村复兴路径。本节在案例基础上整理、对比两种模式的成因与特征（表4），总结发展问题，便于为提出主体合作优化方案提供思路。

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的成因共性在于较好的区位优势，一方面交通便利吸引游客，有助于发挥艺术旅游的经济效益；同时考虑到艺术家稀缺性，大都市边缘区区位为艺术家下乡创造了条件。这限定了艺术介入乡村的对象——临近都市，交通便利。对于两种模式的成因差异，小洲村依托名人效应带动，且临近艺术家集聚的高等学府，其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艺术家主观能动性，艺术家是其效益实现程度的关键。小洲村传统村落的历史底蕴为艺术家进入创造了条件，但考虑到艺术家稀缺

表4 两种艺术介入模式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art intervention

对比项	小洲村——艺术家主导型	风和村——资本主导型
驱动因素	艺术家能动性、区位、名人带动	资本、政府、区位、机场建设
参与主体(先-后)	艺术家-资本	资本-艺术家
主要效益	社会、文化的高层级效益	物质、经济的低层级效益
主要问题	艺术家稀缺性;缺乏资金投入;资本驱逐艺术家	社会与文化效益微弱

性，大多数邻近都市的乡村仍面临缺乏艺术家的限制瓶颈。资本主导型模式的驱动力为资本逐利性，以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拉动物质景观美化。资本更关注乡村的旅游发展潜力，为艺术介入乡村提供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艺术家下乡的门槛。临近都市的区位优势满足资本对发展潜力的要求，通过打造文旅艺术主题小镇，实现乡村旅游发展。

小洲村艺术介入模式目前面临衰落困境，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游客增多，小洲环境条件恶化并缺乏有效治理，影响艺术家创作与游客体验；同时后来资本进入开发造成租金上涨，其绅士化效应驱逐了原先因低租金进入的艺术家，造成小洲艺术衰落。而对于凤和村，由于资本与艺术家为短期的简单雇佣关系，艺术效益停留在低层次效益而未能深化。这实际反映了艺术实践中艺术家或资本单一主体的不足。1) 对于艺术家主导型，一方面，艺术家单一群体能力有限，尤其在整体乡村景观改造、乡村致富方面缺乏经济支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本与艺术家的协调，资本介入的“绅士化效应”无形中对艺术家群体起到驱逐作用，最终造成艺术氛围衰落，资本旅游开发受影响。2) 对于资本主导型，艺术家与资本短期、简单的雇佣关系使艺术家对乡村社区与文化建设缺乏能动性，很难深层次影响村民的社会联系与文化认同。

3.4 艺术介入乡村主体合作优化建议

综合两种模式条件与效益的优缺点，以乡村旅游为出发点，提出资本与艺术家协同、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多方合作建议(图9)，以期为艺术介入乡村模式开拓土壤，发挥艺术实践对乡村的综合效益。

由于该方案以乡村旅游为出发点，旅游收入构成项目运作的核心驱动力，便利的区位优势保证资本开发的旅游市场，因此适用条件为临近都市型乡村。主体合作分工主要包括：1) 政府通过许诺优惠条件吸引资本进行旅游开发，打造高端民宿、艺术展馆与教育基地。2) 资本在政府要求下，①租赁民房，通过协商与村民在租金上达成一致；②长期雇佣艺术家从事乡村艺术实践，给

予艺术家自由创作空间，不限制其创作与教育形式；③进行整体环境改造与整治，维持村内景观整洁、美观。3) 艺术家：①在村内进行自由创作，举办艺术活动并提供艺术培训，吸引游客；②为村内儿童提供福利性艺术培训，关注村内儿童的教育影响；促进村民艺术参与与互动，注重艺术氛围的营造；③注重艺术作品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收益来源：1) 艺术家艺术实践获得资本的经济支持，并依靠展览、教学等方式增加收入，保证艺术家留在乡村。2) 资本依靠民宿、艺术体验等旅游服务获得利润，使其在乡村环境整治、艺术家雇佣等成本外仍有利可图，保证艺术介入乡村项目可持续发展。3) 村民：①出租房屋；②与资本合作，开设农家餐馆或承担向导、保洁等旅游服务工作。

其物质效益体现在资本对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与景观美化；经济效益体现在向村民支付租金并促进就业；社会效益体现在通过艺术实践促进社区参与与内部凝聚力，增强地方认同，并为村内儿童增加艺术教育机会；文化效益体现在鼓励村民参与艺术实践，促进地方文化弘扬与创新。其优势在于：1) 政府介入，统筹资本与艺术家角色。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优惠，利用资本逐利性吸引其进行旅游开发，资本为整村景观美化与村民增收提供经济支撑；另一方面政府要求资本雇佣艺术家，给予其自由创作空间。这既为艺术家留在村中提供经济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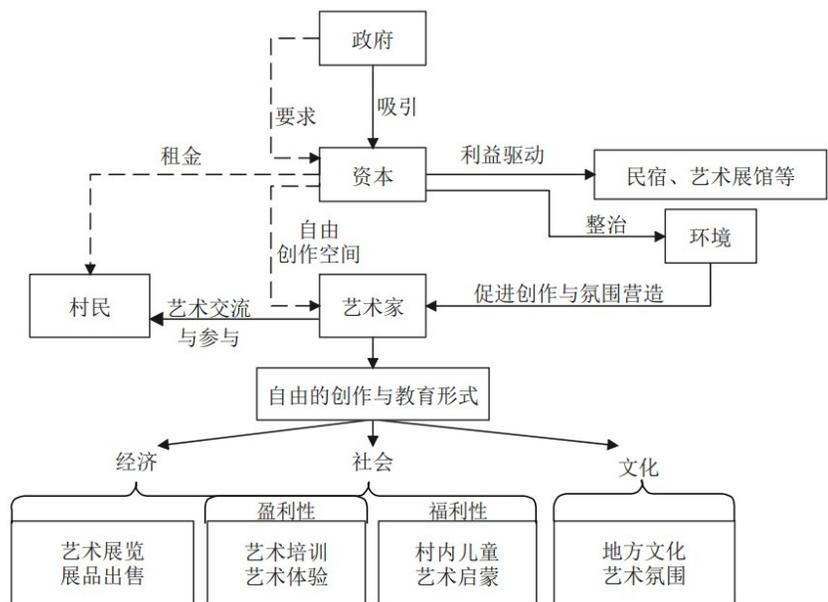


图9 主体合作关系

Fig. 9 Subject partnership

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艺术家稀缺性的局限；同时能够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实现艺术介入低层级效益向高层级转化，兼顾艺术介入多级效益。2) 降低艺术家稀缺性的限制，将适用对象扩大到邻近都市的优区位乡村。区位优势保证了乡村旅游的游客市场，加之艺术实践作为旅游吸引物，使资本有利可图，是多方主体协同配合的经济驱动力。

4 结论与讨论

首先基于文献明晰艺术介入乡村的内涵与类型，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建构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通过在小洲村、凤和村的实地调研，综合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艺术介入模式的效益特征与问题，提出主体合作优化建议。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 艺术介入乡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资本、艺术家与文化团体等主体，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多级效益的乡村振兴模式。目前艺术介入乡村主要包括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模式。

2) 艺术介入乡村效益分为四级：物质景观美化与人居环境改善、旅游经济效益与村民收入增加、优化社区治理与乡缘网络、增强地方认同与文化传承；四级效益由浅入深，逐级递进，低层级效益的滞后可能对高层级效益的发挥起限制作用。

3) 小洲村（艺术家主导型）与凤和村（资本主导型）实地调研显示，小洲村艺术介入效益整体在社会与文化的高层级效益方面最为突出，相较之下，物质与经济的低层级效益有所欠缺；凤和村艺术介入效益整体在物质与经济的低层级效益方面相对突出，相较之下，社会与文化的高层级效益存在不足。

4) 基于两种模式优缺点提出资本与艺术家协同、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多方合作优化建议。其适用条件为邻近都市，综合两种模式优点，具有协调资本与艺术家角色、降低艺术家稀缺性限制的优势。

随着城乡要素加速流动，农村空心化、传统村落破败萧条等问题渐趋明显（刘彦随等，2015）。在此背景下，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正成为活化村庄、留住乡愁的新模式与新趋势。艺术介入乡村在原有的乡村振兴模式基础上强调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是未来中国乡村振兴打通深层次影响的可借鉴

范本。此外，艺术介入乡村在重提乡村价值、发扬农业文化精神、守护城市人口的乡村田园梦方面也具有现实意义，使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文提出的评价体系作为综合性分析框架，对艺术介入乡村效益进行结构化归纳，强调关注各类效益间的层级、联系与转化，可为评价艺术介入乡村的综合影响、指导艺术实践的目标导向与方案设计提供参考，也为艺术介入城市社区的效益分析提供借鉴。但艺术介入乡村也存在局限：1) 艺术家稀缺性对其推广的限制。本文设计方案的适用性尚停留在邻近都市的乡村，艺术家的稀缺性与资本对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要求决定了其须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而对于大多数偏远贫困村落的发展，艺术介入乡村仅停留在个例，尚难以复制推广，其背后是乡村休闲旅游的一般困境（罗云艳，2017）。2) 部分艺术实践难以对村民的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根据文化休克理论（Oberg, 1960），若传统乡土文化与外来艺术文化差异过大，村民完全无法理解外来文化因而产生“文化休克”，因而艺术实践的社会与文化效益很可能失效。其在凤和村已有体现，因此需加强村民对艺术实践的参与，并尽可能促进地方本土文化与外来艺术的融合，或强化本地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创新。未来艺术介入应聚焦在地化、协同合作与重塑乡村主体性。这既需要艺术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深耕艺术下乡实践，同时需要政府、资本有所担当，立足长远发展，综合谋划多级效益。未来研究可以在定性的基础上拓展定量评价，如运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针对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各级效益进行定量比较分析；加强对艺术介入各级效益的微观讨论，不仅聚焦某一级效益的具体表现，同时关注各级效益的作用关系与影响逻辑；扩展对非旅游类艺术介入乡村模式的探讨，探索艺术介入乡村的其他实现形式及其效益特征；最后应加强基本概念、类型的理论系统研究，夯实理论基础并探索其应用实践。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nwar-McHenry Julia, Carmichael Annette and Mchenry Mark P. 2018. The Social Impact of a Regional Community Contemporary Dance Program in Rural and Remote Western Australi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3: 240-250.
- Anwar-McHenry Julia. 2011. Rural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Arts: The Role of the Arts in Civic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 West Region of Western Australi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7

- (3): 245-253.
- Balfour Bruce, Fortunato, Michael W P and Alter Theodore R. 2018. The Creative Fire: An Interactional Framework for Rural Arts-Bas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3: 229-239.
- Bell David and Jayne Mark. 2010. The Creative Countrysid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UK Rural Cultural Econom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6(3): 209-218.
- 蔡继红. 2011. 马斯洛需要层次学说述评. 理论界, (5): 86-88. [Cai Jihong. 2011. Review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Horizon*, (5): 86-88.]
- 陈可石, 高佳. 2016. 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3 (2): 57-63. [Chen Keshi and Gao Jia. 2016. Researching on Rural Revival Mode of Art Involvement of Community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Togo Village, Taina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3(2): 57-63.]
- 陈锐, 钱慧, 王红扬. 2016. 治理结构视角的艺术介入型乡村复兴机制——基于日本濑户内海艺术祭的实证观察. 规划师, 32 (8): 35-39. [Chen Rui, Qian Hui and Wang Hongyang. 2016.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Renaissance from Governance Structure Perspective: A Positive Study of Setouchi Art Festival. *Planners*, 32(8): 35-39.]
- 邓小南, 渠敬东, 渠岩, 王南溟, 郑振满, 张圣琳, 赵世瑜, 王铭铭, 李人庆, 周飞舟, 王长百, 马琳, 梁钦东, 李华东, 吴飞, 毛丹, 江涓, 张志强, 陈进国, 任强. 2016. 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 学术研究, (10): 51-78. [Deng Xiaonan, Qu Jingdong, Qu Yan, Wang Nanming, Zheng Zhenman, Zhang Shenglin, Zhao Shiyu, Wang Mingming, Li Renqing, Zhou Feizhou, Wang Changbai, Ma Lin, Liang Qindong, Li Huadong, Wu Fei, Mao Dan, Jiang Mei, Zhang Zhiqiang, Chen Jinguo and Ren Qiang. 2016. Artistic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onstruction. *Academic Research*, (10): 51-78.]
- 杜宏武, 唐敏. 2009. 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由来·理论·方法.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35 (5): 248-251. [Du Hongwu and Tang Min. 2009. Urban Public Art Planning—Origin-Theory-Method. *Sichuan Building Science*, 35(5): 248-251.]
- 段威, 雷楠. 2014. 浙江天台张家桐村: 基于微介入策略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 北京规划建设, (5): 50-57. [Duan Wei and Lei Nan. 2014. Zhangjiatong Village, Tiantai, Zhejiang: Traditional Villag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Based on Micro-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5): 50-57.]
- 方李莉. 2018. 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 民族艺术, (1): 17-28. [Fang Lili. 2018. Art Intervention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National Arts*, (1): 17-28.]
- 方远平, 易颖, 毕斗斗. 2018. 传承与嬗变: 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地理研究, 37 (11): 2318-2330. [Fang Yuanping, Yi Ying and Bi Doudou. 2018.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37(11): 2318-2330.]
- 冯柯, 王美达, 吴存华. 2018. 文化引领的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以秦皇岛市北戴河村艺术村落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5 (7): 128-133. [Feng Ke, Wang Meida and Wu Cunhua. 2018.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Under Cultural View: A Case of Art Village in Beidaih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5 (7): 128-133.]
- 韩凝玉, 张哲, 王思明. 2019. 艺术唤醒乡土: 传承农业文化精神的智慧之路——以日本乡村振兴模式之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6 (4): 103-109. [Han Ningyu, Zhang Zhe and Wang Siming. 2019. Art Wake Up Native Land: The Wisdom Road that Inherits the Spirit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Take Setouchi Trienna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in the Japanese as the Exampl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6(4): 103-109.]
- 胡家祥. 2015.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 哲学研究, (8): 104-108. [Hu Jiexiang. 2015.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8): 104-108.]
- 胡万钟. 2000. 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谈人的价值和自我价值. 南京社会科学, (6): 25-29. [Hu Wanzhong. 2000. Talking About Human Value and Self-Worth from Maslow's Needs Theory.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6): 25-29.]
- 黄诗雨, 李险峰. 2020. 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研究, 39 (3): 709-720. [Huang Shiyu and Li Xianfeng. 2020.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with Art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39(3): 709-720.]
- 李方悦, 颜佳, 郑崢. 2018. 乡村共同体发展模式探析——以横港村的在地实践为例. 中国园林, 34 (5): 5-10. [Li Fangyue, Yan Jia and Zheng Zheng. 2018.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Community: Taking the In-Site Practice in Henggang as an Exampl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34(5): 5-10.]
- 李伟红, 鲁可荣. 2019. 融合、共享与发展: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松阳经验”及启示.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 (6): 54-60. [Li Weihong and Lu Kerong. 2019.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The Songyang Experience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Its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1(6): 54-60.]
- 刘妹曼. 2020. 乡村振兴战略下艺术乡建的“多重主体性”——以“青田范式”为例. 民族艺术, (6): 135-143. [Liu Shuman. 2020. "Multiple Subjectivity" of Art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Qingtian Paradigm" as an Example. *National Arts*, (6): 135-143.]
- 刘彦随, 周扬. 2015.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32 (2): 97-105. [Liu Yansui and Zhou Yang. 2015.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32 (2): 97-105.]

-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32(2): 97-105.]
- 刘彦随. 2018.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73 (4): 637-650. [Liu Yansui. 2018.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3(4): 637-650.]
- 刘雨菡, 张珊珊, 鲍梓婷. 2016. 艺术介入的社区营造与规划思考. 规划师, 32 (8): 29-34. [Liu Yuhan, Zhang Shanshan and Bao Ziting. 2016. Art Involved Community Creation and Planning. *Planners*, 32(8): 29-34.]
- 卢健松, 刘雅平, 魏春雨. 2012. 当代公共艺术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自组织发展. 中外建筑, (10): 42-45. [Lu Jiansong, Liu Yaping and Wei Chunyu. 2012. Self-Organize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rt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hinese & Overseas Architecture*, (10): 42-45.]
- 罗云艳. 2017. 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实现路径. 改革与战略, 33 (9): 97-99. [Luo Yunyan. 2017. The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China. *Reformation & Strategy*, 33(9): 97-99.]
- 罗子荃, 周秀梅. 2018. 城市公共艺术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创新机制. 学习与实践, (8): 104-111. [Zhou Ziquan and Zhou Xiumei. 2018. The Inner Logic and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Urban Public Art Industry Development. *Study and Practice*, (8): 104-111.]
- Mahon Marie and Hyryläinen Torsti. 2019. Rural Arts Festivals as Contributors to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 *Sociologia Ruralis*, 59(4): 612-635.
- Mahon Marie, Mcgrath Brian and Laoire Lillis O. 2018.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the Arts and Culture in Sustaining Rural Futur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3: 214-216.
- Markusen A. 2007. A Consumption Base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 Application to the Rural Cultural Economy.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 36(1): 9-23.
- Oberg K. 1960. 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7(4): 177-182.
- Park Hayun and Kovacs Jason F. 2020. Arts-Led Revitalization, Overtourism and Community Responses: Ihwa Mural Village, Seoul.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6: 100729.
- Qu Meng, McCormick A D and Funck Carolin. 2020. Community Resourcefulness and Partnerships in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11-17]. <https://doi.org/10.1080/09669582.2020.1849233>.
- 邱冰, 张帆. 2016. 基于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一种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路径. 规划师, 32 (8): 12-17. [Qiu Bing and Zhang Fan. 2016. Public Art Planning Based on Collective Memory: Art Involved Environment Planning. *Planners*, 32(8): 12-17.]
- Seet Pi-Shen, Jones Janice, Acker Tim and Whittle Michelle. 2015. Shocks Among Managers of Indigenous Art Centres in Remote Australia. *Management Decision*, 53(4): 763-785.
- Waitt Gordon and Gibson Chris. 2013. The Spiral Gallery: Non-Market Creativity and Belonging in an Australian Country Tow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30: 75-85.
- Wang Meiqin. 2018. Place-Making for the People: Socially Engaged Art in Rural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32(2): 244-269.
- 杨金华, 章锦河, 陆佩雯, 胡欢, 李克强. 2019. 后现代旅游理念下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以长沙县开慧镇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8 (6): 1287-1295. [Yang Jinhua, Zhang Jinhe, Lu Peiwen, Hu Huan and Li Keqiang. 2019.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Under the Concept of Postmodern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Kaihui Town in Changsha Coun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8(6): 1287-1295.]
- 赵容慧, 曾辉, 卓想. 2016. 艺术介入策略下的新农村社区营造——台湾台南市土沟社区的营造. 规划师, 32 (2): 109-115. [Zhao Ronghui, Zeng Hui and Zhuo Xiang. 2016. New Countrysid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ith Art Strategies: Tugou Community, Tainan City. *Planners*, 32(2): 109-115.]
- 周彦华. 2021. 从极简主义到介入性艺术——艺术的“现场性”及其历史变迁. 山东社会科学, (1): 60-67. [Zhou Yanhua. 2021. From Minimalism to Interventional Art: The “Site Specificity” of Art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1): 60-67.]

作者贡献声明:

庄诺亚:设计研究方案,收集研究数据,绘制论文插图,全文撰写及修改;

杨 忍:指导研究过程,提出修改意见,提升论文质量;

陆进锋:收集研究数据,全文撰写及修改;

翁时秀:提出修改意见,提升论文质量。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Level Benefits of Two Typical Mod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Zhuang Nuoya, Yang Ren, Lu Jinfeng and Weng Shixiu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as a new way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ince various art practices have appeared in Chinese villag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has multi-dimensional benefits such as improving rural landscape, promoting villagers' income, enhancing community connection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ypical mode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benefit hierarchy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and selects Xiaozhou and Fenghe villages in Guangzhou as typical cases to identify the benefi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two modes of artist-led and capital-led art intervention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more on specific case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which have revealed the work procedure and achievements in detail,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differences and a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influence are still worth discuss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is a typical mod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capital, artists and cultural groups realize multi-level benefits such as rural landscape beautification, tourism economic benefits, community cre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local cultural inheritance through art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riving subjects, the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rtist-led and capital-led. (2)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has four levels of benefits: materi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gression by level. (3) The artist-led typ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alizing high-level benefits, while the low-level benefits are lacking; the capital-led typ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alizing low-level benefits, while the high-level benefits are lacking. (4) Building a multi-party cooperation model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capital and artist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can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he benefits of the two modes and make the rural practice of art intervention more replicable. In summary, this study divides the practice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China into two types: artist-led and capital-led, constructs the four-level benefits hierarchy based o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compares the four-level benefits between Xiaozhou village and Fenghe village, and summarizes the benefi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rtist-led mode and the capital-led mode. For its contributions, it innovatively applie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into the study of art interven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enriches the case study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China and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multi-level benefit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Xiaozhou Village; Fenghe Village